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6.007

# 农民起义悲剧之艺术呈现的一体两面

## ——《水浒传》与《荡寇志》主题思想比较研究

赵炎秋, 王国顺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水浒传》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发生、发展的传奇,《荡寇志》则叙述了梁山起义军被剿灭的故事,两部作品题材类似,主题思想却大异旨趣。《水浒传》与《荡寇志》中的两支农民起义军都将招安作为自己的出路,但最终都以悲剧收场,只是悲剧的程度有所不同。《水浒传》对农民起义基本持肯定态度,其从生命力、官府逼迫、反抗性等方面对农民起义军进行了肯定性描写;《荡寇志》则对农民起义持彻底否定态度,其侧重从称帝的可能性、暴虐性等方面对农民起义军给予了否定性描写。从艺术表现看,《水浒传》叙事清晰,其全力塑造起义英雄人物,多角度描绘人物特点;《荡寇志》则缺乏绘声绘色的人物形象刻画,但其语言精到,叙事精彩。

**关键词:**《水浒传》;《荡寇志》;农民起义;招安悲剧;肯定性描写;否定性描写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9)06-0043-07

**引用格式:** 赵炎秋, 王国顺. 农民起义悲剧之艺术呈现的一体两面:《水浒传》与《荡寇志》主题思想比较研究[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4(6): 43-49.

## Two Sides of the Artistic Presentation of Peasant Uprising Tragedy: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Themes of *Water Margin* and *Dang Kou Zhi*

ZHAO Yanqiu, WANG Guoshu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Water Margin* describes the story of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easant uprising army headed by Song Jiang in the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 *Dang Kou Zhi* describes the story of the demise of the Liangshan Uprising Army. The content of the two works is similar, but themes are different. The peasant uprising army in *Water Margin* and *Dang Kou Zhi* both choose to accept amnesty and they end up in tragedy, but the degree of tragedy is different. *Water Margin* makes affirmative descriptions of the peasant uprising army from the aspects of vitality, government persecution and resistance. *Dang Kou Zhi* completely negates the peasant uprising, and describes the possibility of claiming to be an emperor of the rebellious leader and the cruelty of the army. From

收稿日期: 2019-09-23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课题“明清小说叙事学研究”(12A091)

作者简介: 赵炎秋(1953—), 男, 湖南邵阳人, 湖南师范大学“世承人才计划”领军人才, 二级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与比较文学; 王国顺(1992—), 男, 河南林州人,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

the perspective of artistic performance, the narrative of *Water Margin* is clear, and it fully shapes the heroes of the uprising, depi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racters from many angles; *Dang Kou Zhi* lacks the portrayal of the characters, but its language is refined and the narrative is wonderful.

**Keywords:** *Water Margin*; *Dang Kou Zhi*; peasant uprising; amnesty tragedy; affirmative description; negative description

农民起义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对抗朝廷专制的一种形式,这种“自下而上”的斗争形式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书写对象之一。《水浒传》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发生、发展的传奇,《荡寇志》则叙述了梁山起义军被剿灭的故事。对两部小说中的农民起义及其悲剧性的结局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增进我们对我国古代农民起义小说的认识,而且有助于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理解,进而领会两位作者对于农民起义的不同态度,以及小说在内容安排和艺术上的不同之处。

#### —

《水浒传》与《荡寇志》中描写的两支农民起义军的活动时期是在北宋末年,此时中国的封建社会还处于全盛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出现了一点萌芽。在这种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时期的农民起义,可能的结局只有三个:被剿灭、招安、自己做皇帝。换言之,其只有被现政权消灭、纳入现政权之中、自己夺取政权这三种结局。

《水浒传》与《荡寇志》的基本思想倾向都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在这方面,二者没有本质的区别。从两部小说的描写来看,农民起义军虽然在与官军的作战中经常处于优势,但实际上仍是割据地方的武装力量,其体量与势力无法与皇帝为代表的中央政权同日而语,甚至在民心向背上也无法与朝廷抗衡。这也是为什么那些进入梁山和猿臂寨的起义英雄,大都是在自己实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被迫加入义军的原因。宋江集团与陈希真集团除了所占领的山寨之外,甚至连稳固的根据地都没有,其后勤供应主要依靠各种战利品和对大户人家的征集和抢劫。起义军在与官府派来围剿的军队的战争中虽然经常获胜,但这种胜利只是局部性的、暂时的,并不能说明起

义军真正具有与朝廷全面对抗的力量,更不能说明他们有夺取全国政权的力量。这从梁山举全寨之力攻打曾头市和祝家庄这种小规模的地方武装,却久攻不下甚至损兵折将就可看出。同样,在《荡寇志》中,陈希真集团在与官军的较量中也常常力不从心。由此可见,两支起义军都没有具备夺取全国政权的力量。

另一方面,朝廷也没有迅速剿灭起义军的能力。两支起义军凭借地理优势、内部的团结和同仇敌忾的精神以及战略战术的灵活,多次打败前来征剿的官军,在局部上保持着对朝廷的某种优势。长时间内,朝廷对于起义军处于欲剿不能、欲罢不得的尴尬状况。

再从起义军内部情况看,两支起义军的主要成员都是因为官逼民反才被迫走上反抗的道路的。起义军内部,实际上存在着浓厚的忠君思想。

先看两支起义军的首领,忠君是义军首领宋江和陈希真的基本思想,《水浒传》与《荡寇志》精心刻画了宋江与陈希真的忠义行为。“宋江作为反抗主流社会的绿林英雄的领袖,却怀抱并坚持传统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孝和忠。”<sup>[1]</sup>义、孝、忠三个因素是宋江的行为准则,义是基本,从属于孝,统归于忠。宋江以义闻名,他在担任郓城县押司时仗义疏财、救人危难,这一因素是他结识大批英雄的基础。义是宋江为人处世的基本手段,但当义和孝发生冲突时,宋江义无反顾地选择孝。如宋江在被发配江州途经梁山时,毅然拒绝落草为寇,违背了原先与花荣、王英等人投奔梁山的约定,原因就是其父宋太公对他的忠孝嘱咐。而在孝之上,则是忠。忠统摄义与孝,贯穿宋江的一生。当有选择余地时,宋江宁愿接受杀人后的刑法制裁也不愿上山为寇;成为梁山首领时,他积极主张招安;招安后遭受朝廷谋害时,他依然奉行忠的原则,不顾“义”,亲自下手毒

害了危及“忠”的李逵,从而保全了梁山整体的忠。陈希真的忠君思想在《荡寇志》中也被描写得十分细致。陈希真父女被高俅父子逼迫,两人因此成为猿臂寨起义军的一分子。在这个过程中,陈希真的举动表现出鲜明的忠君倾向:上山前在雷祖面前置杯焚祈祷,上山后坐头把交椅时遥望东京跪拜并祈求谅解,取得青云山胜利时又建造万岁亭议事,陈希真招安之前的诸多行动都与忠君有着密切联系。

再看起义军的其他成员,虽然梁山上武松、鲁智深等部分头领,他们只想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向往“论称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快活生活,也有像李逵那样,偶然叫叫“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头领,但大部分头领如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花荣、朱仝、雷横等本来就是朝廷官员,实际上都有忠君思想,希望能够与朝廷妥协,求得一官半职,获得封妻荫子的正果。这些人与宋江一起,掌握了梁山的主要权力。因此,在梁山起义军中,忠君的思想实际占了上风,招安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

而陈希真集团中忠君、招安的思想就更加浓厚。相较于宋江集团,陈希真集团的英雄数量较少,且身份较为单一,人物落草前的身份主要是军官和军官后人,这就决定了陈希真集团接受招安的顺畅性。刘广急切救母,但是落草前坚持“活着是大宋的人,死了是大宋的鬼”,祝永清在接受投降时则以招安作为条件之一。宋江集团主要通过宋江之口传达起义军接受招安的意图,而陈希真集团中的各个英雄人物都是亲口表明了归降朝廷的决心。另外,维系陈希真集团多个领导人物之间的因素除义气之外,还有亲情关系。陈希真、陈丽卿、刘广、刘麒、刘麟、刘慧娘等人具有血缘关系,陈丽卿与祝永清、祝万年与栾廷芳的外甥女是夫妻关系,这样就将祝氏兄弟、栾氏兄弟一同纳入整个家族之中,猿臂寨的领导层由此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宗族体系。“孝”是“血缘伦常之本,也是人道设教社会政治伦理规范的约定,是一切道德的自然与社会基础”<sup>[2]</sup>,因而在以“孝”为本的宗族内部,陈希真能够凭借宗族长辈与起义军首领的双重身份支配起义军内部的军事行动,有效遏制起义军与朝廷的战争。

这样,招安就成为两支起义军的必然选择,当

然也是朝廷的最好选择。经过一段时间与朝廷的对峙、战斗之后,两支起义军队伍都先后走上了招安的道路,均被纳入朝廷的管辖之下。

## 二

两支农民起义军都将招安作为自己的出路,但最终却都以悲剧收场,只是悲剧的程度有所不同。

《水浒传》中起义军的结局是一个彻底的悲剧。首先,作为起义军首领的宋江,曾率领梁山好汉征讨辽国与方腊集团,不但他的不世之功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可,相反他还遭到朝廷大员的嫉妒,最终在官场的漩涡里被毒害。其次,梁山的各位头领,他们的结局与招安前的预期大相径庭。一百零八位好汉聚义梁山,他们期待着招安后的富贵生活,然而经过与其他武装集团的战争,一百零八位好汉只剩三十六位,而且侥幸存活头领无法获取正常的军功奖励,他们的结局或是被毒害、沦为游民,或是逃往别国、出家等。另外,农民武装的基础力量也被消灭,普通士兵或者编入朝廷的军营成为其一分子,或者朝廷支付少许的金币回乡当差。随着宋江与多数头领的死亡、士兵的改编,农民起义军的力量消亡殆尽。

由于为朝廷剿灭了心腹大患宋江集团,而且对朝廷的伤害也不如宋江集团那样严重,《荡寇志》中的陈希真起义军的结局比宋江起义军要好一些。但认真分析,这支起义军的结局也是悲剧。农民起义军是与朝廷相对抗的,其被招安就意味着这种对抗性不复存在,即使起义军的大多数成员得以保全,但其作为农民起义军队伍则不复存在了。虽然俞万春为了否定宋江集团而对陈希真集团进行了各种美化的描写,除了让陈希真在胜利之后退隐江湖,走上一条潜心问道的道路之外,起义军除陈丽卿外的其他头领也都成为朝廷官员,起义部队则全部改编为朝廷军队,貌似起义军得到了较好的结局。但这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即陈希真集团作为一支农民起义军已经不复存在。

俞万春对农民起义持强烈的否定态度。明清时期《水浒传》泛滥,俞万春认为“越是小说闲书越传播得快,茶坊酒肆,灯前月下,人人喜说,个个爱听”<sup>[3]</sup>。宋江集团所谓的“忠义”行为严重违背俞万春的“忠君”“正统”思想,这样就可以理解,《荡寇志》为什么要延续《水



传》中的故事,描写宋江集团被全部剿灭的过程。由于剿灭宋江起义军主要是由陈希真集团进行的,所以俞万春不得不给陈希真集团安排一个读者可以接受的结局;但从长远的角度看,这不会是陈希真集团的真正结局。俞万春在小说中开宗明义地说:“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sup>[3]</sup>这就明确地预示了宋江集团以及陈希真集团的最终命运。

那么,为什么两支起义军接受招安都必然是悲剧呢?这可以从多个方面探讨。

首先,从性质看,起义军与封建王朝是对立的。但从历史的发展阶段看,农民起义军又不可能采取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因此,他们即使推翻了现政权,也只能采用与现政权相同的形式建立新的政权,成为新的封建统治者,这实际上是对其起义初衷的背叛。起义军如果无力推翻现政权,则只能被现政权剿灭或者被现政权纳入其中,也即被招安。时代的局限决定了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悲剧性。

其次,招安实际上是起义军与官府之间所做的一种交换——官府转换农民起义军的身份,起义军维护国家统一。它意味着起义军再次成为遵守朝廷制度的平民。身份的改变造成农民起义军由叛乱走向臣服,进而为国家征战的宿命。现政权拥有赋予农民起义军合法身份的权力,朝廷可以凭借这种特权不断吸纳、补充新的力量,从而达到使农民起义军相互厮杀,并逐渐稀释、瓦解起义军的目的,这也是造成被招安的起义军的悲剧原因之一。

再次,农民起义军由于其造反的前科,不被朝廷(皇帝)信任,这是造成其悲剧的又一重要原因。这里的关键是“专制统治者不承认老百姓有权利争取自己的利益”<sup>[4]</sup>。起义,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意味着对朝廷的反叛与背叛,会被作为永久的政治污点记入史册。作为朝廷的权力中枢,皇帝的支持可以改善起义军与官府的关系,但是皇帝对农民武装的忠心始终持有一种怀疑态度。如宋江起义军接受招安后朝廷设宴款待,枢密院官员建议将宋江军马拆分,削弱起义军的反抗能力,但是起义军头领因为封赏问题不愿执行这种命令,他们高喊再次返回梁山。皇帝听闻消息后的表现是“大惊”,农民起义军的行为已经引起

君主对其忠诚的质疑,这就使得农民起义军领袖在一定时期得到的皇帝的信任和支持,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失去,从而造成悲剧的不可避免。

《荡寇志》中的陈希真集团在接受招安之前也受到朝廷官员的阻拦,童贯认为起义军都是“亡命之徒”,他试图改变皇帝封赏招安起义军的决策,在遭到皇帝拒绝后,小说中写到一个行为——旁顾群臣,这一举动暗示着在朝廷中必然存在众多不信任起义军的官员。

第四,贪官污吏占据朝廷核心位置,众多朝廷官员不断排挤被招安的起义军。农民起义军与贪官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起义军落草为寇源于贪官压迫,然而贪官始终掌握朝廷的核心权力。招安后的起义军要想在斗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只能永远保持力量不被分散,保持军事上的强势地位,但这又与他们招安的初衷,以及招安后希望过荣华富贵的安逸生活的想法相悖。如果听凭朝廷摆布,那么,他们的力量就只能被逐渐削弱,并最终被敌对力量消灭。《水浒传》中的宋江获得天子封赏,高俅、杨戩等人立即心情低落。《荡寇志》中陈希真与张鸣珂设计告发蔡京的通敌卖国行径,陈希真认为朝廷上类似蔡京的官员众多等,都是明证。贪官的大量存在使得招安后的起义军领袖无法获得应有的权益。

最后,起义军的整体素养、习惯、处世规则等与整个朝廷的官僚系统也有矛盾。管子认为“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sup>[5]</sup>。农民起义军起于草莽,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这势必与养尊处优、文化教育普遍较高的官僚集团形成冲突,双方彼此难以相融。另外,农民武装由于缺乏稳固的根据地,不得不通过劫掠等方式维持生活,由此形成的那种不喜约束的个性也难以适应纪律严明的军队生活,并且起义军都是义气相投的好汉,他们豪放洒脱的行事风格与谨小慎微的官僚作风存在冲突。宋江起义军出征辽国前,朝廷各级官员克扣起义军的物资,两者因为此事发生口角,甚至出现命案。起义军将士恩怨分明的性格与朝廷官员伪善阴险的作派水火难容。

自然,农民起义的悲剧性并不意味着农民起义缺乏必要性和正义性,因为归根结底,农民起义是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与无法克服的弊病造成的。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农民起义在总体上无法

找到一条不同于其所反抗的政权的新的社会形态和政权组织形式, 但起义的发生, 对于克服这些矛盾与弊病, 推动社会的发展是有益的, 因此也是必然的和正义的。

### 三

施耐庵和俞万春都认识到了农民起义的悲剧性, 但两部作品对于农民起义的态度却是不同的。《水浒传》作者从正面描写了农民起义, 《荡寇志》作者则从反面描写农民起义。《水浒传》对农民起义基本持肯定态度, 而《荡寇志》则对农民起义作了彻底的否定。这种不同, 决定了两部小说对农民起义军刻画与描写的不同。

《水浒传》作者从生命力、官府逼迫、反抗性等三个方面正面突出起义军的形象。《水浒传》的前半部分描绘了众多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英雄。气力与酒是生命力的两个重要因素; 气力是生命力的直接展现, 酒是生命力的催化剂。小说在英雄气力的描写上着重凸显了鲁达、武松的千斤之力。鲁达“身長八尺, 腰闊十围”, 武松则是“身躯凜凜, 相貌堂堂”, 体貌雄伟反映出两者气力不凡。小说中与两人气力相关的情节主要有“拳打镇关西”“倒拔垂杨柳”“景阳冈打虎”“醉打蒋门神”等, 作者重点描写两人施展拳脚的力度、被施力者的表现。如鲁达与郑屠打斗的过程中, 每一拳之后郑屠的脸部特写都能够使读者意识到鲁达的气力。此外, 酒在两者生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一, 酒强化胆量与勇气, 武松吃酒之后无视景阳冈上店小二“三碗不过岗”的警告, 连续吃了十五碗酒后打死猛虎, 在“醉打蒋门神”之前, 他宣称自己“带一份酒便有一分本事, 五分酒五分本事”<sup>[6]365</sup>, 将酒与气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二, 酒赋予人物冲破世俗的动力。鲁达杀人后在赵员外帮助下进入五台山文殊院, 寺庙的戒律处处束缚着他, 清醒时鲁达尚能克制自己, 饮酒后便开始恣意妄为。他在门外的叫骂、推翻金刚的神勇, 表现出原始的生命力在酒的作用下蔑视俗世的豪情。梁山英雄的生命力是起义的生理条件, “官府逼迫”是梁山起义军反叛的必要条件。官府通过两种方式使英雄落草为寇: 一种表现为直接欺压, 官员以某种私人目的(敛财、娶妻等)借助权力谋害英雄, 英雄们为生计奔向梁山, 林

冲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另一种表现为间接逼迫, 梁山在招兵买马的过程中也主动采取计策笼络各路豪杰, 计谋的运用使得英雄们的行为直接、间接地形成对官府的反叛, 官府施加压力反而使其倒戈相向, 从而选择走向梁山的道路。“反抗性”是“官府逼迫”的结果, 梁山英雄的反抗与斗争精神是小说赞扬的部分。小说中的反抗可以根据英雄数量分为个人反抗与群体反抗。每个英雄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官府压迫使他们奋起反抗, 走向一条以暴制暴的道路。宋江本是一位不肯落草的忠义英雄, 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 但是醉酒后在浔阳楼吟诵反诗, 这一举动经过官员告密惹怒朝廷, 死亡难以避免, 最终他在晁盖、李逵等人的帮助下杀死黄文炳。这样, 个人的反抗随着仇人的死亡趋于平衡。群体反抗需要一定的规模, 英雄的人数众多。梁山群体的反抗集中在与宋朝军队的战争中, 双方作战规模巨大, 起义军胜利意味着反抗取得成效。施耐庵在叙述的过程中也特别突出宋江起义军每一次军事活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宋江集团攻打青州、大名府的军事行动都是源于拯救被困的英雄, 这种举动对应小说中以义气结交的众位英雄, 并且宋江等人劫掠而不占有贪官统治下的城池, 他们只是获取生存的物质资料, 不危害百姓生活, 情节的设置突出了梁山好汉行为的合情合理。

《荡寇志》对农民起义军的描写则是否定的。俞万春反对农民起义, 他在《荡寇志》中着重描写宋江集团的不齿行径, 以此说明农民起义军触犯封建统治者的利益。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 称帝的可能性。农民起义军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团体, 这种扩张性始终对朝廷构成威胁。《荡寇志》并没有明确描写宋江的称帝行为, 但是他攻占兖州城、泰安府等地, 派遣军队守卫城池, 特别是宋江等人占据曹州杀死高衙内后的对话: 吴用认为应该镇守曹州, 而且“倘从此因利乘便, 渡过黄河, 直取宁陵, 则归德一府震动, 而河南全省可图矣”<sup>[3]332</sup>。作者随后用“大喜”二字表达宋江的心情。攻取四都之一的归德的意图彰显着宋江起义军试图推翻宋朝皇帝的阴谋。《荡寇志》中的宋江起义军已经不同于《水浒传》中的宋江起义军, 前者的劫掠行为已经从最初的被迫谋生演变为威胁国家政权, 统治者必须剿灭其以维护政



权稳定。宋江称帝的意愿也借助谋杀招安钦差显现出来,如张鸣珂认为宋江“包藏祸心,其志不小。朝廷首辅,草野梁魁,皆不足以满其愿”<sup>[3]270</sup>。由此可知,《荡寇志》中的宋江集团已具备一定的政治目标,他不同于明确提出以取代宋朝帝国为宗旨的方腊集团,也区别于施耐庵笔下坚持接受招安的宋江起义军。其二,农民起义军的暴虐性格。小说一开始便呈现出一个残暴的起义军形象,杨腾蛟策反南旺营的军民,而后协助云天彪取得胜利,蔡京却在梁山的威胁下归还城池,紧接着呼延灼屠杀反叛的嘉祥、南旺的百姓。农民起义军环境的逼迫使得他们不得不采用暴力作为与外界斗争的主要手段,俞万春则将这种倾向夸大为对百姓的屠杀。这样,梁山起义军受到百姓、政府的双重挤压,必定走向灭亡。另外,《荡寇志》中多处借助他人反衬宋江的不当行为,如八十八回中猿臂寨粮食紧缺,下属希望攻打州县借粮,陈希真则宁死不肯劫掠百姓,之后他通过开矿、游民种田、贸易等手段保障了山寨的兴盛,俞万春借此否定了农民起义军为求生存劫掠百姓的行为的合理性,将《水浒传》中逼不得已的借粮行为描写成不可饶恕的罪责。

#### 四

由于对农民起义的不同态度,两部小说在内容安排与艺术的描写上也有很大不同。《水浒传》叙事清晰,全力塑造起义中的英雄人物,多角度描绘人物特点。《荡寇志》缺乏绘声绘色的人物刻画,小说侧重语言的精到和叙事环节的精彩。

《水浒传》整体叙事简单明了,小说描绘了农民起义军从发生到结束的过程,前后界限分明。前七十一回描写众多英雄聚义梁山的过程,后三十回主要描写宋江等人征辽国与伐方腊的行动。小说的前半部分集中刻画英雄人物,这也是小说最出彩的部分。《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出场有声有色,小说往往采用先声夺人的方法,利用声音引出英雄人物,然后再从视觉方面展示人物的形貌、衣着等,人物形象清楚、栩栩如生。如吴用的出场,当雷横与刘唐厮打得难分难解时,一人叫道:“你们两个好汉且不要斗!我看了多时,权且歇一歇,我有话说。”<sup>[6]174-175</sup>此时读者立即将注意力转移到说话人,继而作者倾力描摹

说话人外貌,“看那人时,似秀才打扮:戴一顶桶子样抹眉梁头巾,穿一领皂沿边麻布宽衫,腰系一条茶褐鞦带,下面丝鞋净袜;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须长。”<sup>[6]175</sup>书生身份、外貌清秀、衣着白净的特点与其擅长谋略的性格十分契合。《水浒传》中主要人物的性格也十分有特色:首先,不同人物具有相同性情,这也是梁山聚义的重要条件。梁山起义军的聚合是不同英雄之间相同性情的集合,梁山好汉的共同特点是嫉恶如仇,他们反抗社会的黑暗势力,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不平之事。英雄们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义薄云天,义气是梁山众人沟通的重要媒介,也是梁山集团发展壮大的最重要因素。小说中经常叙述英雄之间的义气,尤其在宋江集团招降攻打山寨的军官时,宋江总是以义气令各路军官信服。其次,不同人物具有不同性情,这是区别人物的重要标志。《水浒传》采用链式叙述的方式,先描写几位主要人物,随后在主要人物的事迹中串联起次要人物,主要人物的性格各有特色。鲁达性情纯真,李逵天真烂漫、心直口快,吴用足智多谋。再次,施耐庵特别注意刻画人物在相似场景与相似性格下的区分度,这是细化人物性格的表现。人物之间有相同事件。同为杀虎,武松与李逵表现不同,武松沉着冷静,有步骤地一闪、一躲、一跳,李逵则用刀搠、戳、砍,武松稳重机智与李逵急躁冲动的一面跃然纸上。施耐庵也力求勾勒出相似性格的细微差别,“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sup>[7]</sup>由此,诸多人物的性格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人物面貌丰富。另外,施耐庵还赋予人物多样化的性格,人物的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武松凭借在景阳冈上打死猛虎成为政府的公职人员,知法守法。兄长被谋杀后,他先报告官府,在得知政府法律无法为武大郎伸冤之后,他亲自邀请街坊邻居录供画押,杀死西门庆与潘金莲之后没有逃跑,而是主动接受官府审判,武松勇于担当的性格使得官府从轻宣判。大闹飞云浦是武松性格转变的关键,他逼迫官差吐露官员杀害自己的原因。得知真相后他从遵守朝廷法度的顺民蜕变为恩怨必报的好汉,不仅杀死在鸳鸯楼上喝酒的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三人,

而且残忍地杀害了众多无关人员,并且用“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八个字主动交待自己的身份。两次杀人后都是主动承担责任,前者主动承担杀人的罪责是顺民的遵守法度,后者主动承认身份是个人的快意恩仇。他的性格随着社会的逼迫发生变化,这种多重性格使得梁山人物更加立体化。

相较于《水浒传》,《荡寇志》中起义军英雄的出场则略显简单,性格较为单薄。猿臂寨的主要人物是陈希真、刘广、祝永清、刘慧娘、陈丽卿,五位人物的出场平淡无奇,只是承接上文故事简单介绍。祝永清、刘慧娘、陈丽卿的形象模糊,作者通过只言片语一笔带过,作为主人公的陈希真,作者甚至未加详细描述,读者只知道他是一位法力高强的道士。俞万春并不细致描摹主要人物的身形,而是集中表达人物的单一品质——忠君,作者采取重复式书写的方式表现他们的共同特点:蔑视梁山、忠于朝廷。小说一开始即叙述了陈道士拒绝梁山招揽,之后借刘广寄给苟桓的信件阐明刘广一家的立场,而后祝永清选择加入猿臂寨的前提是拒绝起义军编入梁山。作者反复强调三人的忠义,整部小说中三人的性格缺少变化。

《荡寇志》中的人物缺乏特色,但是文章“是漂亮的,描写也不坏”<sup>[8]</sup>。其小说语言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人物语言更加规范化,它舍弃《水浒传》中的口语化语言,语言更加书面化,具有典型的文人创作特点。小说中人物对话的称谓、词语相对正式,并且常常伴随着一些说教用语。如陈希真劝说刘广奔赴猿臂寨时讲述的“忠孝”说辞:忠孝经常出现矛盾,但是处理得当依然可以同时获得。陈希真启发陈丽卿夫妇的语言更是具有哲理化的特色,他借助人生常见之事阐述人生变幻不止的道理,规范化的语言使用升华了哲理。第二,语言描述细致顺畅。作者善于观察生活,注意描写各个细节,尽量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如陈希真父女逃亡京城,因为行程劳累陈丽卿未加收拾便匆忙入睡,陈希真第二天提醒她小心财物、遮盖身体等;两人雇佣庄家时的流程,雇佣后庄家将货物摆弄匀称的动作,庄家渴望雇主打赏酒钱的心理,作者事无巨细地描写整个出逃过程,语言的细腻赋予小说极强的真实感。《荡寇志》不仅语言出色,叙事环节也令人称道。小说叙事

线索围绕剿灭梁山的主线展开,以猿臂寨起义军为主,夹杂叙述云天彪军队、徐槐军队、张叔夜军队等几个阵营的情况,杂而不乱,叙事过程跌宕起伏。如宋江集团利用奔雷车大败云天彪军队,军师刘慧娘却病入膏肓,她的健康影响整个故事的走向,之后作者安排唐猛擒获金钱豹、陈念义捕捉参仙等情节。长生药虽然获得却无法给予千里之外的刘慧娘,康捷的到来化解了一切困难。整个情节一波三折,满足了读者的审美趣味。另外,小说的叙事内容也有独特之处,其在叙述战争时对武器的描绘增添了故事的可读性。小说中出现了许多新式武器,如飞天神雷、陷地鬼户、沉螺舟等。这些武器设计精巧,如飞天神雷利用勾股算术准确投掷雷子,陷地鬼户可以有效改变战场格局。武器的使用加速了战争的胜利,也使得小说叙事更加有趣。

《水浒传》与《荡寇志》表现出中国文人根深蒂固的忠君观念,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之下,农民起义军的结局呈现一种悲剧性。两部小说也展示了农民起义军的两面性,农民起义军由于政治的腐败与官府进行斗争,也因为自身的不足而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对两部小说的主题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既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农民运动的进程,也可以让我们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更加辩证地看待农民起义发生和失败的原因。

#### 参考文献:

- [1] 熊明. 宋江: 反抗道路思考的人格化呈现[J]. 明清小说研究, 2015(4): 156.
- [2] 王凌皓, 王晶. 先秦儒家礼教思想的历史定位及现代镜鉴[J]. 社会科学战线, 2015(4): 226.
- [3] 俞万春. 荡寇志[M]. 俞国林,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4] 王学泰. 话说“招安”: 上[J]. 社会科学论坛, 2003(11): 38.
- [5] 黎翔凤. 管子校注: 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2.
- [6] 施耐庵, 罗贯中. 水浒传[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 [7] 金圣叹. 金圣叹文集[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7: 236-237.
- [8] 鲁迅. 鲁迅全集: 第9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336.

责任编辑: 黄声波